

#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情感治理机制

李斌,韩一冉

(西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600)

**摘要:**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情感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重要议题,二者通过经济基础与社会心理的双向互动形成深度耦合关系。在城乡融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呈现出地域空间开放化、功能定位明晰化、情感激励实效化的显著特征;集体记忆重构、利益情感融合、城乡情感互动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情感治理的重要时代价值。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微观层面通过利益分配与情感认同的双向建构,在中观层面以乡村经济与情感空间的协同重塑,在宏观层面以治理现代化与情感融合的制度创新,形成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情感治理的互动机制。在具体实践中,以产业融合创新情感治理的经济载体,以土地制度激活情感认同的产权基础,以要素流动构建情感联结的双向通道,以治理创新完善情感凝聚的制度体系。

**关键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乡村情感治理;收益情感化;情感化资本;协同治理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5X(2026)02-0073-12

2025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指出,“支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加强乡村治理”<sup>①</sup>。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不仅为乡村公共服务改善、文化活动开展提供物质支撑,更让村民在共建共享中增强对乡村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既激活了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又让乡村情感治理有了坚实的物质依托和群众基础,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演进逻辑与情感治理意涵

### (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情感治理的理论基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促进乡村情感治理以情感资本理论、共同体理论以及社会认同理论为重要基石,致力于通过情感认同的精心培育、价值共识的广泛形成,实现乡村社会的柔性治理,为乡村发展注入温暖且持久的力量。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5年第31期,第2-18页。

收稿日期:2025-11-07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与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村庄情感治理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4XJA840001)。

作者简介:李斌,男,陕西洛南人,法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乡村治理研究;韩一冉,女,山东德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情感资本即情感资源,诸如支持、耐心与承诺,既可以在家庭内部树立起来,也可以通过外部的社会交往获取,“通过情感的交互和关系产生价值、技能和财富”<sup>[1]</sup>。在乡村情境下,情感资本是一个具有“社会、文化和历史复杂性的交互形式”<sup>[2]</sup>,传统的地缘、血缘关系构成了乡村情感资本的初始网络。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引入外部投资与人才时,亟须对这一网络进行拓展,构建新的信任与合作网络,推动资源整合和产业成长。情感资本所包含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等要素,在乡村情感治理中可转化为村民对村集体发展的责任意识和各主体之间高效的沟通渠道,进而增强集体内部的凝聚力与决策效能。

共同体理论侧重于强调成员对特定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滕尼斯提出的共同体概念,将基于自然情感、血缘地缘的乡村共同体与基于理性算计的社会相区分。在传统乡村,以家族为核心的共同体依靠伦理、习俗维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在现代社会冲击下,“普遍性焦虑下心灵与情感的漂浮成了现代人的典型症候”<sup>[3]</sup>,乡村共同体面临解构风险。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新载体,通过集体产业项目,超越传统狭隘的地缘血缘限制,重塑了乡村共同体,赋予共同体经济利益联结功能,在“国家-社会”关系中关注乡村“各主体情感关系以及差异化的利益诉求满足”<sup>[4][7]</sup>,使村民在共同劳动、共享收益中强化情感认同。

社会认同理论关注个体如何通过与特定群体的认同来界定自我身份。泰弗尔认为,个体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通过社会分类、群体认同和比较,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sup>[5]</sup>。在乡村,村民对集体的认同影响其行为选择。当集体经济发展良好,村民在分红、就业等方面受益时,会将自身与集体紧密联系,积极参与集体事务,提升自我认同,形成积极的集体认同。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sup>[6]</sup>深刻揭示了传统乡村情感联结以地缘血缘为核心的特征,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像水的波纹一样,由近及远、由亲至疏地形成关系网络。在这一格局下,乡村情感治理受限于家族、邻里关系,难以实现广泛的社会动员与资源整合。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情感治理迫切需要突破这一局限,构建利益、情感双重纽带,实现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在“组织层面上提升社会动员能力,价值层面上强化农民的国家认同感”<sup>[7]</sup>。一方面,以集体经济的利益分配、就业机会等物质利益为基础,吸引村民参与集体事务;另一方面,借助文化活动、集体仪式等情感载体,强化村民之间的情感联系,将单纯的经济利益关系升华为情感认同关系。

## (二) 集体经济从传统到新型的转型特征

传统农村集体经济因产权封闭、政经合一治理及狭隘情感联结,限制要素流动与市场融合;而新型集体经济通过“三权分置”和股份合作制打破地域桎梏,在实现“功能拓展型融合”<sup>[8]</sup>的同时吸引外部主体形成大共治格局,呈现出开放性特征;通过资产确权与股份量化明晰产权,推动村民从模糊归属转向积极认同,结合情感治理与数字手段促进多元协作,呈现出明晰性特征。同时,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与贡献挂钩的动态分配机制,以发展贡献股等激发村民参与热情,呈现出激励性特征,形成良性互动氛围,实现“协同治理”<sup>[9]</sup>。

### 1. 地域空间开放化

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以其复合的产权特征、复杂的治理结构、单一的产业结构以及狭隘的群体情感等特征呈现出明显的封闭性特点,对农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造成了深远影响。从历史演进角度看,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人民公社时期,逐步形成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sup>[10]</sup>产权格局,土

地、大型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且局限于特定村域范围内。在这样的产权制度环境下,土地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其流转和配置被严格限定在村集体内部范围,这阻碍了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使劳动力等要素难以完成跨区域优化配置,即便是村域范围内劳动力富余,也难以通过市场调节参与村域外就业,自然也就限制了农民增收渠道。从治理模式角度看,传统农村集体经济长期实行“政经合一”<sup>[11]</sup>体制,人民公社既是基层政权组织,又是集体经济经营主体。在这种模式下,生产计划、资源分配等经济活动一般由行政指令来主导,不具有市场灵活性,生产大队同生产队在组织生产经营事务时,需严格依照上级行政部门制定的生产计划来执行,比如种植什么作物、种多大面积、产量要达到多少等皆由上级规定,村民以被动接受指令为主,难以在集体经济发展方向、资产配置与运营等关键决策中拥有话语权。集体经济组织的决策过程,多由少数管理人员主导,缺乏充分的民主协商与程序透明度,监督机制亦不健全。这种封闭模式导致村民参与集体事务的内在动力持续弱化。

从集体成员情感联结角度来看,传统农村集体经济的封闭性特征,导致集体成员的情感联结局限于狭隘的地缘血缘关系,形成了相对固化的村落共同体情感依赖。在这种依赖模式下,基于地缘关系,村民长期生活在特定的共同村落空间,共享水源、道路等公共资源,形成了紧密的邻里情感纽带。基于血缘关系,家族在村落社会结构中占据重要地位,祠堂、族谱等文化符号成为凝聚家族成员情感的关键载体。这种村落共同体情感依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村落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维持村落社会的秩序稳定。农忙时节,以家族为单位的互帮互助行动在乡村农业资源共享、粮食品质把控、整体农事安排等公共事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其弊端也逐渐显现。相对固化的情感依赖使村民对外部市场信息与资源的接纳意愿较低,阻碍了农村集体经济与外部市场的深度融合。在面临外部投资机会或新型产业合作项目时,村民因对陌生事物的恐惧与对既有村落秩序的过度维护而拒绝合作,错失发展机遇。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三权分置”制度创新深入推进产权制度改革,以股份合作广泛应用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从根本上突破了传统的地理与市场边界限制,彻底消解了长期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障碍,重塑了农村经济生态与社会关系网络,实现了“新农人”“城归”<sup>[12]</sup>等“外生性情感主体”<sup>[13]</sup>的主动流入,缓解了乡村治理主体“‘心’的缺场问题”<sup>[14]</sup>,以情感联结为纽带,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形成“大共治,小自治”<sup>[15]</sup>格局。

## 2. 功能定位明晰化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有着清晰的功能定位。在产权结构方面,严谨、系统的资产确权以及科学合理的股份量化等举措使集体成员原本模糊不清的财产权利变得归属明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集体经营性资产进行全面梳理与评估,按照人口数量将其精准量化为股权,为每一位村民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股权证。村民凭借股权证参与集体收益分红,产权的明晰化促使村民对集体的情感认知发生质的转变,从过去的模糊归属情感升华为基于明确财产权利的权利认同,极大增强了村民对集体事务的关注程度与参与热情,使村民“依托现有乡村治理平台、非正式治理规则”<sup>[16]</sup><sup>102</sup>,以情感策略实现乡村多元治理主体同舟共济。从治理逻辑上看,乡村情感治理的逻辑起点是“乡情回归”<sup>[17]</sup>,用以解决熟人社会基础塌陷等现实问题,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以明晰的产权所有与利益关联勾连起村民与集体、村民与村民之间协作共进基础上的情感依附,形成“情感共同体”<sup>[18]</sup>。从情感培育上看,品德展现、利益赠予、结合认知、依托中介是四种有效的“情感培育机制”<sup>[19]</sup>。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实践中,品

德展现体现为集体经济组织带头人以公正廉洁的治理行为与奉献精神构建情感信任;通过股份分红、公共服务供给等利益赠予让渡实现集体收益与成员福祉直接挂钩,将经济利益转化为情感依附;借助政策宣讲、议事协商等方式推动个体对集体价值的理性认知向情感认同转化;以乡贤理事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为纽带,利用在地性权威与网络资源,衔接个体与集体、内部与外部,成为情感传导的依托中介,培育新型集体经济中的情感共同体。

### 3.情感激励实效化

乡情治理需要通过“声誉、场合、互惠、信任、共识”<sup>[20]</sup>等一系列微观机制发挥作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大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打破了传统集体经济经营体制的内部封闭循环,推动集体经济组织与广阔的外部市场实现深度对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积极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将经济收益与成员贡献紧密挂钩,实现激励的精准化与高效化。新的分配方式充分考虑不同成员在集体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化付出,改变了“大锅饭”式的平均分配模式。对于在集体项目中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或凭借自身技术、资源为集体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村民,给予相应的经济回报与荣誉认可,极大地增强了情感激励的有效性。在该机制推动下,村民参与集体项目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投身于集体产业发展,形成人为集体、集体为人人的良好发展氛围。

###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情感治理的时代价值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提出,“创新治理方式”“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sup>[21]</sup>。乡村作为协作生产、血缘、地缘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特殊场域,本身具有共同体的属性,“情感要素是维系乡村社会整合的重要变量”<sup>[22]</sup>。中国式现代化是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共同富裕和精神共同富裕相协调的现代化。要实现精神共同富裕,“情感是基本的、不可或缺的、具有核心地位的元素”<sup>[23]</sup>。情感治理集动态化捕捉社会情感需求、科学配置治理工具、精准定位治理目标为一体,构建从“情感识别、干预实施到效果评估”<sup>[24]</sup>的完整治理链条。区别于制度治理、技术治理的刚性治理方式,在以“熟人社会”和乡土情感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情感治理体现了柔性治理的优势。“合理运用情感治理,能够有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实现”<sup>[25]</sup>。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进程中,情感治理具象化为三个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维度。

首先,集体记忆重构。集体记忆是乡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村民对过去集体生活的回忆与情感,凝聚着社群历史经验与情感认同,在乡村社会文化建构中占据核心地位。通过系统梳理与重构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叙事,有效激活乡村社群的集体情感编码,强化村民对共同体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借助文化符号的体现与历史场景的叙事重现,把抽象的集体记忆化作可感知、能领悟的现实认同,依托集体经济发展的契机对乡村开展空间再造,依靠对历史文物、文献档案等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整理陈列,深入挖掘口述史、影像记录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载体,组建多元化集体记忆叙事体系,推动村民在文化实践和互动体验中实现集体记忆的现代性转变,进而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凝聚广泛共识。

其次,利益情感融合。创新设计一套将经济收益分配与情感激励有机结合的机制,有效达成物质利益与情感价值的双向推动和共生进步,实现物质回报与精神激励的深度融合,搭建情感化的收益分配情景与价值认同体系,使经济活动兼具物质交换与情感互动的双重特性。在集体经济发展中表现突出的成员不仅能获得较高的收益分配,还能享受到荣誉表彰、

经验分享等情感激励,把个体贡献及集体发展成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强化村民对自身经济行为与集体目标相关性的认知,形成物质激励与情感驱动双向强化、协同作用的良性治理循环。

最后,城乡情感互动。城市与乡村的情感交互现象,积极促进了城乡情感价值的互通与融合。借助搭建城乡主体情感互动的实践平台,冲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情感认知壁垒,打造城乡情感价值互补共生的新型关系成为乡村情感治理的紧要任务。在集体产业布局及发展进程中,以多样化的城乡互动场景及协作模式为依托开展深度交流,推动城乡文化、观念及情感体验的相互渗透与不断融合,是实现城乡情感互动的现实路径。这种双向互动使城乡间的情感隔阂得以弥合,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多元而持续的情感动力。

## 二、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情感治理的互动机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制度创新与结构优化,在微观、中观、宏观层面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从传统管控向现代情感治理转型,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秩序维系、价值共识凝聚与治理效能提升的多维目标。

### (一)微观层面:利益分配与情感认同的双向建构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通过创新动态分配机制,构建起利益分配与情感认同的双向互动体系。该机制将经济收益转化为物质激励与情感激励的复合资源,实现从经济理性向社会理性的价值跃迁。在分配结构设计上,借鉴股份制经济的股权配置原理,构建包含基础股、贡献股、福利股在内的多元股权架构。基础股依据成员权配置,保障所有农民基本经济权益,维系分配正义;贡献股以劳动投入、技术创新、管理才能等生产要素为衡量标准,激活要素市场活力;福利股针对鳏寡孤独等特殊群体实施定向保障,彰显集体主义伦理关怀。这种差异化分配模式,既符合效率优先原则,又实现了分配正义的精准落地。

从作用机制来看,物质层面的收益保障构成情感认同的经济基础。持续增长的分红收入满足农民生存与安全需求,增强其对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依赖。物质层面,当经济回报超越预期,农民会产生风险偏好转移,主动将个人资源嵌入集体生产网络。精神层面,分配过程的仪式化设计与文化嵌入成为情感认同的关键变量。例如,分红大会通过空间布置、程序编排、话语叙事等符号系统,将经济活动转化为集体记忆生产的文化场域。荣誉表彰机制构建“象征性资本”积累通道,历史叙事唤醒乡土文化基因,使分配行为升华为价值认同的情感仪式。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满足,促使农民完成从被动接受者到价值共创者的角色嬗变。此外,分配机制将经济奖惩转化为行为规范的软约束,构建起“利益引导—规范塑造—价值内化”的情感治理链条。经济奖惩与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相结合,通过利益杠杆强化集体价值导向,促进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与良好风尚的形成,有效实现了乡村社会秩序的再生产与集体价值的代际传承。

### (二)中观层面:乡村经济与情感空间的协同重塑

乡村作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核心场域,其经济发展与情感治理呈现出显著的协同演化趋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情感空间重塑提供物质基础与动能支撑,而情感空间的

优化则通过社会资本积累与文化认同强化,反作用于经济发展,形成双向赋能的动态系统。

在产业融合维度,乡村依托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源整合优势,构建以特色产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实现了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更重要的是通过产业链条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创造出多元的情感互动场景。企业与乡村之间基于产业关联形成的经济纽带,突破了城乡二元结构下的制度治理中“情感阈值的缺位”<sup>[16]104</sup>,借助产业文化节、技术交流会等非正式制度安排,构建起不同技术拥有者情感交流的新通道。农民在产业链各环节的深度参与,使其收入结构从单一的农业收入向产业多元复合收入转变,这种经济角色的转变增强了农民对乡村经济发展的价值认同,促使其将个人发展目标与乡村经济发展目标相统一。

在空间重构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配合地方政府土地综合整治、宅基地改革等制度落地,推动空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乡村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有机统一。一方面,通过保留村内传统建筑风貌、修复历史文化遗迹等方式,将村民文化记忆和美好情感嵌入物质空间;另一方面,通过规划村民活动中心、文化广场等公共空间,构建起以集体共同活动为基础的社会空间网络。这些承载着乡土文化基因的公共空间,成为村民开展情感交流、文化传承与社会交往的重要精神空间,维系村民对乡土社会的情感纽带,增强其对新型居住空间的心理认同与归属感。

此外,从公共服务与人力资本发展视角来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与人才流动,进一步深化情感空间重塑。集体经济收益反哺公共服务领域,遵循公共产品均等化原则,推动教育、医疗、文化等优质公共服务在乡村优化布局,这种高质量服务供给不仅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更通过服务过程中的情感互动与人文关怀,重塑了乡村居民的情感边界。人才流动作为城乡要素流动的重要维度,返乡人才将城市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与创新理念引入乡村,同时又扎根于乡村传统文化土壤,形成“文化杂交”<sup>[26]</sup>效应。这种文化碰撞与融合,促进了城乡文化的双向交流与重构,提升了乡村社会的包容性与开放性,为乡村情感空间注入新的文化内涵与活力,推动乡村社会从封闭的熟人社会向开放的情感共同体转型。

### (三)宏观层面:治理现代化与情感融合的制度创新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创新,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乡村场域的实践投射,通过构建制度环境与情感治理的耦合机制,实现治理效能与情感认同的协同提升。“政经分开”改革打破传统乡村治理中经济与行政职能混同的制度惯性,以产权明晰化、职能专业化为核心,重构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等治理主体的权责边界。这种制度变革通过减少组织间的职能重叠与权力博弈,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提升经济运营效率与社会治理效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为推动乡村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了重要引擎。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反哺乡村公共服务体现了空间正义与情感治理的融合,本质上是对乡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创新。“不同地区、年龄层次、性别甚至不同个人,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偏好都有所差异”<sup>[27]</sup>。一方面,针对不同群体需求,对集体经济积累进行再分配,以差异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不同村民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养老托育、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提升村民对集体发展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对公共设施改造时积极融入情感化元素,把村民熟悉的乡土文化

符号植入村中道路桥梁、文化场馆等物质载体,使其成为承载村民情感认同的“集体象征物”<sup>[28]</sup>,实现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文化赋能。同时,合理利用乡村集体经济资金建设“一站式服务”场所,创新“上门服务”形式,搭建村集体与村民间的便捷式服务平台和常态化情感联系纽带,实现村级公共服务有保障、组织服务村民有平台、村民表达诉求有渠道、乡村情感维系有纽带、乡村治理有作为的目标。

制度设计优化保障乡村情感治理。2019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通过村级党组织书记兼任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制度设计,打破了以往乡村治理由单一的自上而下的科层式行政命令的格局,转变为全体村民共同参与,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上的自下而上的情感对话和党群互动。这种情感治理格局不但为乡村公共服务增添了温度和人文关怀,而且实现了乡村社会持续稳定、治理适配性强和村民获得感高的共建共治共享目标。

### 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驱动乡村情感治理的实践路径

#### (一)产业融合:创新情感治理的经济载体

将情感要素嵌入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与情感治理创新的重要范式。集体经济可通过“增加本地就业机会、促进村庄经济发展和改善村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sup>[29]</sup>。从产业发展视角看,产业融合是技术创新与制度变革驱动下的必然趋势,其通过打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边界,促使资本、技术、人力等要素跨产业渗透整合,催生出农业文化旅游、农产品深加工服务等新型业态,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情感要素的融入,则满足了新时代消费者对产品与服务的情感价值诉求,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依托地域文化资源,对传统农耕文化、民俗文化进行挖掘与重构,将文化符号、文化记忆嵌入新型农村集体产品开发和供给的全过程。在产品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赋予农产品、乡村服务产品情感符号与文化内涵,通过品牌故事、包装设计等方式,将产品转化为情感交流的媒介,构建消费者与乡村集体经济的情感联结。在消费场景营造方面,结合各类情感主题对乡村场景进行重构,满足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消费者对乡村文化的消费需求,使不同群体消费者从各自所需的乡村空间体验里获得情感共鸣。在服务供给方面,以乡村集体产业为依托,对传统民宿、休闲农庄等服务设施进行优化,构建沉浸式、集体化生产生活场景,打造集体生产、分工协作、利益共享的全新体验模式,弥补消费者情感个体化、孤岛化的缺失。

#### (二)土地制度:夯实情感认同的产权基础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将产权明晰与情感联结有机结合,融合农民对于土地的“功能依赖和情感依恋”<sup>[30]</sup>,对激活乡村情感认同具有重要作用。产权明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主体平等参与经济活动的前提。新时代以来,通过土地确权的形式在法律框架下精准界定多元利益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对于减少市场摩擦、实现资源最佳配置意义重大。从深层意义上讲,在乡村社会中,土地已经冲破传统生产资料的边界,成为勾连村民生命记忆、凝聚家族情感、实现文化传承、形成地方认同的物质载体。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乡土性”概念,精准道出了“乡”与“土”之间的血脉相通,土地集空间属性与文化属性于一体,形成乡村土地、村民与乡

土文化的和谐共生和情感价值。因此,稳定的土地制度是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基础。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以“三权分置”为基础,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的明晰化为土地制度改革提供了土地产权的全新界定路径。这一路径是对传统产权的深化与拓展,其核心要点在于把土地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纳入产权制度设计。在土地确权过程中,通过构建“数字化档案管理系统”<sup>[31]</sup>,精准记录某一地块的历史演进、归属更替、文化记忆等非经济属性信息,使土地档案和产权证书从单一法律凭证转变为承载乡村变迁记忆的文化载体。这既能保障产权主体的经济权益,又能激发村民对乡村土地的历史记忆与情感,实现经济价值与情感价值的契合,进而提升土地产权制度的文化适配性与社会凝聚力。

产权情感化拓展是土地制度情感激活的另一重要维度。产权制度的演进不仅受经济利益驱动,还受到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保障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基本经济权能的基础上,土地权能的情感化拓展体现了制度变迁过程中对社会价值观念演变的回应。土地经营权作为土地产权的核心权能之一,其流转与配置不仅涉及经济效率问题,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情感内涵。允许土地经营权在家族成员或亲友之间流转,本质上是将土地作为情感信物,通过产权流转实现家族情感的传递与延续,这种流转方式在维系家族关系、强化血缘纽带方面具有独特作用。此外,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采取自营、出租、入股、合作等多种方式盘活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sup>[32]</sup>,将土地权能与乡村文化活动相融合,以土地经营权入股乡村文化产业项目,既是对土地权能内涵的创新拓展,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文化振兴与产业振兴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通过这种方式,村民在参与集体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能够将对土地的情感认同转化为文化创造与经济实践的双重动力,进而提升土地权能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形成经济利益与情感认同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收益情感化分配是乡村特定场域文化属性和社会关系的情感生产体现。乡村社会关系直接影响到交换报酬,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凭借掌握的分配资源生发出的“非对称的依赖关系”<sup>[33]</sup>,在资源分配机制中有效嵌入情感维度,能够显著增强村民的集体归属感与合作意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设立乡村情感扶持基金,从土地收益中按比例提取一定资金专项用于支持乡村文化事业,实现土地经济收益向情感资本的战略转化。这一机制借助文化资本的持续积累与代际传递,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保障优良乡风乡俗的传播与延续,使土地从纯粹的生产要素转变为维系乡村情感共同体重要纽带。从制度设计层面看,收益情感化分配机制通过将经济资源转化为“人文化渲染”<sup>[34]</sup>的文化资本,达成了土地制度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有机融汇,为乡村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及情感支撑。

### (三)要素流动:构建情感联结的双向通道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其群体动员优势便于形成“群体团结”<sup>[35]</sup>,产生情感共同体,推动人才、资本等要素流动与情感互动融合,把握“农民形态、产权制度和空间布局等因素所引发的基础秩序变动”<sup>[36]</sup>,构建起乡村情感联结机制。要素流动不仅是资源配置的经济过程,更是社会关系重构与情感网络建构的社会过程。在人才流动维度,人力资本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生产要素,其空间配置与情感认同存在显著的双向作用机制。人才的价值实现需求与情感归属需求具有内在统一性。吸引人才回流和促进乡村内部人才流动,本质上是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人才资源优化配置与情感认同培育的协同。“乡贤文化契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乡村基层文化的结合”<sup>[37]</sup>,以反哺家乡、带动集体发展为内容,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

体建立制度化的乡贤荣誉激励机制,将乡村人才的贡献转化为可量化的价值符号,这种符号化的评价体系不仅能够满足人才的自我实现需求,还能通过社会认同机制强化其与乡村场域的情感纽带。在乡村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人才作为关键行动者,其情感认同的提升能够有效激活社会网络中的信任关系与互惠规范,进而促进乡村社会的协同治理与可持续发展。

情感化资本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在资本流动领域,资本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其空间配置过程蕴含着深刻的情感维度。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积极引入外部资本与促进乡村内部资本循环,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利益考量,形成资本与乡村社会的情感联结机制。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集乡村经济发展与村内公共服务供给为一体的特殊法人组织,可以实现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创新性融合,将情感化资本投入转化为文化符号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使投资者的经济行为获得情感价值附加。以功德碑、褒奖铭等形式为代表的情感地标的建设,不仅是物质空间的改造,更是社会记忆与情感认同的空间重构。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空间载体,通过铭刻投资者的个体印记,将资本流动转化为可感知的情感实践,实现资本所有者与乡村社会的深度互动。同时,资本流动过程中的情感互动机制,能够有效缓解城乡二元结构下要素由乡村向城市“单向流动困境”<sup>[38]</sup>,促进资本要素的双向循环与可持续利用。

情感化技术是乡村发展的重要载体。情感化技术是“利用现代技术手段,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模拟与仿真,让受众生发出直达内心世界的独特情感体验”<sup>[39]</sup>,构建具有情感内涵的乡村场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新兴技术的应用,为乡村情感联结提供了新的可能,有利于建立更具人性关怀、公正性和包容性的“数字乡村治理体系”<sup>[40]</sup>。技术的情感场景化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赋能实现乡村文化记忆的数字化重构与情感空间的再生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积极投资建设数字乡村博物馆,将乡村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形态,这种技术中介化的文化呈现方式,打破了时空限制,使乡村文化记忆的传承获得超越时空、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在村村民在场化体验、不在村村民云端追忆,使数字乡村博物馆成为城乡之间、乡村内部情感交流与融合的重要媒介,为乡村治理注入情感动力与文化活力。

#### (四)治理创新:完善情感凝聚的制度体系

乡村社会中,“国家、市场、村庄等多元主体相互嵌套,构成了复杂的治理网络”<sup>[41]</sup>。构建党建引领下的“三治融合”治理体系,是乡村情感治理的核心内容。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治理中的领导核心地位,不仅体现为政治方向的把控,更表现为通过组织动员与情感治理实现社会整合的制度优势。新时代的乡村党组织书记除了担负一般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引领职责外,还以村委会主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的多重身份整合了乡村的经济和社会功能,使党组织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实践紧密结合,确保了党的为民情怀能够真正落地。实践中,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运用深度访谈、入户调研等系统性方法,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既践行了群众路线,也规避了传统行政管理的单向性与低效性,这种情感治理方式能够触发村民的心理反应机制,产生“情感性政党认同”<sup>[42]</sup>,进而有效提升治理效能。从实现党的执政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追求相统一的角度看,情感治理的理想效果是“合法、合理、合情”<sup>[43]</sup>。传统的乡村科层式行政治理以合法、合理为核心目标,往往难以实现合情,而建立在生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治理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兼具工具性和功能性意义,能够实现“私人情感向公共精神的转化、国家权力渗透与乡村自我运作的双向促进”<sup>[4][7]</sup>。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信任关系网络,发挥族老、乡贤等非正式权威的调解作用,通过情感沟通、心理疏导等方式,不仅化解矛盾纠纷,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秩序与情感和谐,而且有利于促进情、理、法融合的调解原则制度化。这种有经济保障、联结群体利益、关照个体困境的情感治理方式以乡村情感为纽带,实现乡村社会认同感、归属感的全面提升,共享积极向上的乡村精神,对于实现乡村善治有着深层次的价值。

“三治融合”的实质是实现情感治理驱动下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在自治维度,情感议事方式能够通过个体情感表达实现集体意志达成,不仅提升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而且强化了村民、村内组织之间的情感依赖度;在法治维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凭借立法保障组织合法合规运转、集体资产保值增值,确立了农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与收益权,通过法律制度有效调适组织与成员之间的“合法”利益关系,同时在遵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通过集体决策为乡村弱势群体、公益事业发展提供“合情”的利益分配与服务供给。在德治维度,集体产业发展中的协作生产、民主管理、树立典型、激励表彰等实践探索,能够促进村规民约、道德评议等德治机制的自我生长,驱动孝老爱亲、与邻为善、邻里互助等乡村传统美德的传承与创新。

## 四、结论与展望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稳步发展为乡村情感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同时,乡村情感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又为集体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源源不断的情感资本与内生动力。二者的深度融合,为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坚实而持久的内源性支撑。但同时必须看到,乡村情感治理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在实践中应避免将情感治理简单化、形式化,而需将其深度融入集体经济决策、分配、监督的全流程,实现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乡村情感内驱式认同和共同情感驱动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统一。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乡村集体数字化技术对情感治理的影响机制,以及跨区域集体经济合作中的情感融合机制等现实问题,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乡村情感治理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提供新的思路,真正实现乡村经济发展与情感治理的协同推进、相得益彰,为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开辟新的发展路径。

## 参考文献:

- [1] Helga Nowotny. Women in Public Life in Austria. In C. Fuchs Epstein and R. Laub Coser(eds. ). Access to Power: Cross National Studies of Women and Elite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 147-156.
- [2] 刘祎莹. “走出去”的县中生:情感作为一种资本赋能的自传民族志[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6): 22-28.
- [3] 李勇, 陈水映, 徐燕. 乡愁可寄:乡村短视频中乡愁景观化生产表征及机理[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3, 35(3): 1-13.
- [4] 朱浩. 情感治理的场景实践与新型乡村共同体的构建:基于S市农村睦邻场景的类型化分析[J]. 探索, 2024(3): 77-94.
- [5] 王卓琳, 罗观翠. 论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对社会集群行为的观照域[J]. 求索, 2013(11): 223-225.
- [6] 谢立中. 析“差序格局”或“伦理关系”主导说: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再审视[J]. 学术月刊, 2025, 57(2): 120-131.

- [7] 印子.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77(1): 163-172.
- [8] 高雅, 耿刘利. 农村产业融合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理阐释与政策含义[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2, 34(3): 1-9.
- [9] 陈晓东, 郭淑洁. 基于协同治理视域“五社联动”助力城市基层社区治理研究[J]. 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2025, 37(2): 32-40.
- [10] 粟联.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仅是生产单位规模大小的问题[J]. 学术月刊, 1964(4): 28-30.
- [11] 徐冠清, 崔占峰. 从“政经合一”到“政经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治理的一个新逻辑[J].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1(5): 26-37.
- [12] 刘玉珂, 黄静. “城归”群体赋能乡村振兴的三维解析[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35(6): 119-125.
- [13] 潘小娟. 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治理探析[J]. 中国行政管理, 2021(6): 6-10.
- [14] 鲁君, 陈红霞.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提升机制优化: 基于陕西省L县的微观实例[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5(6): 75-85.
- [15] 孟群, 史云贵. 规模之累与尺度重构: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何以可能[J]. 天津行政学院学报, 2024, 26(6): 56-64.
- [16] 侯万锋.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乡村情感治理: 维度、困境与进路[J]. 甘肃社会科学, 2024(2): 101-108.
- [17] 陈桂生, 吴合庆. 情感治理何以成为乡村社区治理的新转向: 基于“治理有效”的解释[J]. 求实, 2022(4): 96-108.
- [18] 沈费伟, 陈晓玲. 保持乡村性: 实现数字乡村治理特色的理论阐述[J]. 电子政务, 2021(3): 39-48.
- [19] 包涵川. 迈向“治理有机体”: 中国基层治理中的情感因素研究[J]. 治理研究, 2021, 37(1): 98-108.
- [20] 蓝煜昕, 林顺浩. 乡情治理: 县域社会治理的情感要素及其作用逻辑: 基于顺德案例的考察[J]. 中国行政管理, 2020(2): 54-59.
- [2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18(29): 9-47.
- [22] 杨慧, 吕哲臻. 个体化视域下乡村社会情感共同体重塑[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2(2): 89-98.
- [23] 何雪松. 情感治理: 新媒体时代的重要治理维度[J]. 探索与争鸣, 2016(11): 40-42.
- [24] 张冉. 中国基层社会情感治理的理论探赜与实践布局[J]. 中州学刊, 2025(3): 74-82.
- [25] 曹静晖, 梁富欣. 从“各行其是”到“同舟共济”: 乡村情感治理的生成逻辑[J]. 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3): 148-156.
- [26] 潘娜娜. 文化杂交理论视域下中国文化主体性的构建[J]. 中州学刊, 2017(11): 91-95.
- [27] 欧世平. 基于善治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探析[J]. 江淮论坛, 2013(3): 44-48.
- [28] 王海洲. 论象征的生成机制: 从分类到类比[J]. 江海学刊, 2016(6): 5-11.
- [29] 贾蕊, 郭彤, 吴彦瑶, 等. 集体经济能缓解乡村人口“空心化”吗?[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25, 35(4): 200-211.
- [30] 程军. 土地依存与土地流转困境的突破: 一个新型理论分析框架[J]. 云南社会科学, 2020(6): 29-34.
- [31] 郑清洁, 李明秋. 国土资源业务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J]. 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12, 20(1): 49-54.
- [32] 郑雄飞, 刘婕. “城乡两栖”视角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问题研究[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6(2): 110-119.
- [33] 朱侃, 岳经纶, 涂斌. 借势增能: 行政差序格局下社会组织建构资源拓展能力的内在逻辑: 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实证分析[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25, 26(3): 100-111.

- [34] 章荣君,张向向.新质生产力赋能乡村社区共同体空间营造:内在机理、现实反思与发展路径[J].求实,2025(3):95-108.
- [35] 罗坤瑾,刘艳莎.乡村体育赛事的群体情感动员及空间仪式化生产[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33(2):101-112.
- [36] 陈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秩序[J].政治学研究,2024(2):94-107.
- [37] 范建华,袁媛,周丽.嵌入型治理: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逻辑与实践路径[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2):64-75.
- [38] 钱文荣,郑淋议.构建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与融合的制度保障体系:从权利开放理论到村庄开放实践的分析线索[J].南方经济,2021(8):24-34.
- [39] 方正.数智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场景化的应用图景、问题透视与行动路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45(6):209-217.
- [40] 王佃利,滕蕾.数字社会治理的场景构建、运行逻辑与公共价值实现[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25-133.
- [41] 何瑞,王春燕,吴旭红.技术与情感共舞:乡村治理变革的双重治理逻辑与路径:基于江苏省Z市Y村的案例考察[J].电子政务,2025(10):57-70.
- [42] 刘丽莉,温碧霞.党建引领下的乡村情感治理实现机制[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3(5):120-129.
- [43] 刘太刚,向昉.“以规治情”与“以情治情”:社区情感治理的再认识[J].中国行政管理,2021(6):11-18.

## The Mechanism of Rural Emotional Governance Driven by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Li Bin, Han Yir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600,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rural emotional governance ar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 two have formed a deeply coupled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two-way interaction between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social psychology.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shown prominent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ical spatial openness, clarified functional positioning, and effective emotional incentiv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the integration of interests and emot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emotions are the important era values of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in promoting rural emo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two-way construction of interest distribution and emotional identity at the micro level, the coordinated reshaping of rural economy and emotional space at the meso level, and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emotional integration at the macro level, the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has formed an interactive mechanism with rural emotional governance. In specific practice, we should tak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to innovate the economic carrier of emotional governance, take the land system to activate the property right basis of emotional identity, take factor flow to build a two-way channel for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take governance innovation to improve the institutional system for emotional cohesion.

**Key words:**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rural emotional governance; emotionalization of income; emotionalized capital; coordinated governance

[责任编辑:张俊英 杨洪]